

知识翻译学研究

张佩瑶中国传统译论英译研究

——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为例

魏丽杰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将翻译历史现场与时代翻译实践结合考察,拓展了中国译学研究的视野,赋予翻译研究新的学术内涵。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本文探讨著名翻译家张佩瑶在《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中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知识加工、话语重构及译本传播,发现张佩瑶通过知识考古与丰厚翻译对中国翻译话语进行知识加工、通过太极推手与话语互证调和并重构中国翻译话语、通过译本传播与读者评价将译作知识的专业性和国际国内影响力纳入考察范围,确保了中国特色话语由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为当前中华典籍外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5-0171-11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5.013

0 引言

在当前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新形势下,构建国家翻译学知识体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变得尤为重要。本世纪初,为了在国际学界发声,为了“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对话,张佩瑶(2004:7)呼吁构建“中国翻译话语系统”,并汇集国内外翻译界著名专家学者耗费经年心血推出《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以下简称《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提出了翻译史研究的太极推手路径(The Taiji Pushing-Hands Approach),率领团队“以兼顾中西传统的胸襟与视野,从中国历史悠久的翻译话语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项目“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严复《天演论》经典建构研究”(sisu202312)、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严译《天演论》术语译介与传播研究”(SISU2026XK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丽杰,女,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史及翻译与文化研究。

引用格式:魏丽杰.张佩瑶中国传统译论英译研究——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为例[J].外国语文,2026(5):171

-181.



本刊微信公众号

出发,提出与西方翻译传统分庭抗礼的论述,为世界的翻译史与翻译论补充欠缺已久的重要拼图”(张旭等,2014:5),推动本土及国际译学的发展,构建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目前有关《选集》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译者的翻译策略、副文本、软实力、失语症与话语批评等视角,肯定了张佩瑶在构建中国翻译话语方面的贡献,但张佩瑶在《选集》中如何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知识加工、话语重构及译本再传播的文化行为与社会实践似乎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有鉴于此,从知识翻译学视角考察张佩瑶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过程中的知识考古与丰厚翻译路径、太极推手与话语互证模式及《选集》的译本传播和读者评价体系,将文本、历史、文化与传播有机结合,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评价张佩瑶在将中国传统译论英译过程中为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而做出的贡献。

1 知识考古与丰厚翻译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98:237)在其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分别对“知识”“考古学”做了界定,指出“考古学在知识中找到自己分析的平衡点”,但并未对“知识考古学”作出明确界定。有学者认为,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关于“知识”和“话语”的形成以及运作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分析方法,它着眼于考察贯穿在不同文本中的话语构成及话语准入,研究它们如何建构文本,如何使文本具有意义,并在相应的文化语境和社会领域中承担某种特定的话语功能(胡安江,2022:13)。在《选集》编撰过程中,张佩瑶将知识考古与丰厚翻译相结合,为目标读者呈现独特的中国翻译话语。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安东尼·阿皮亚(Appiah,1993:817)将“丰厚翻译”界定为“通过注释和附加按语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学语境中的一种学术翻译”。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知识生产”及“话语建构”过程中,张佩瑶“通过注释和附加按语”将翻译话语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充分体现了知识翻译学“翻译是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的概念内涵(杨枫,2021:2)。

知识翻译学认为任何翻译都是地方性知识的世界化社会行为(杨枫,2023:2)。张佩瑶在《选集》英译过程中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迁移、传播出发,致力于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杨枫,2022:2),推动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建设。《选集》全书安排有前言、简介、传略、文献、索引、总索引及目录,将各个条目置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为目标读者提供背景知识的同时,激发其对译本的关注和兴趣,从而推动中国翻译话语的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纵观《选集》全书,张佩瑶将知识考古与丰厚翻译贯穿始终。以《选集》第一部分为例,张佩瑶共收录25条东汉以前的中国古代翻译话语,并译介了大量看似与翻译

话语关联不大的中国古典文论,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文”“质”“雅”“俗”等概念。在这 25 个条目中,仅有四个条目(7、8、10、20)没有增补评论,但其前均添加了内容提要以补充相关背景知识。以条目 1 为例:

The Way [Tao 道] that can be spelt out [tao 道] is not the constant Way [Tao 道].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constant name. Nothingness is the name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Substance is the name of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Cheung, 2010: 23)

在该条目序言中,译者以五倍于正文内容的篇幅补充了作者老子的生平经历、代表作品、思想主张及广泛影响,帮助目标读者理解中国话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评论部分,译者指出“道”是中国古代道教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在脚注部分,张佩瑶经过知识考古发现历史上名为“老子”的人有两位,且有两本书的书名均为《老子》。其中,距今时间久远的那本共 2 000 字,较近的另一本有 5 000 字,时至今日对中国思想家影响深远的为距今较近的版本(Cheung, 2010: 22-23)。在知识考古与版本考证的基础上,张佩瑶对老子本人及其代表作品《道德经》进行了历史溯源及话语重构,确保了《选集》的专业性、故事性与文学性。

丰厚翻译是知识考古的话语实践,知识考古是丰厚翻译的专业保证,二者共同承载着知识加工、话语重构和文化交流的功能。在《选集》编撰过程中,张佩瑶通过对重点词汇加注、正文前添加引言、标明引文出处、辅以脚注和评论等丰厚翻译策略,对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语句和典故进行话语重构。如条目 13 关于“君子”(The Man of True Virtue)一词的论述中,张佩瑶将之与条目 25 中“君子”的英译“prince”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这种有意而为之的同词异译法进行了历史溯源。张佩瑶指出,西周时期(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君主的儿子被简称为“君子”(jūnzi)即“王子”(prince),该时期“君子”一词主要指涉一个人的身份尊贵值得他人敬仰,与个人的道德品质并无关联。后来,孔子赋予该词新意,强调个人的高贵品质和成就。孔子认为,无论一个人是否出生于王室,只要其品行高贵、成就斐然,即为“君子”(Cheung, 2010: 34)。作为孔子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君子”一词的含义因历史语境不同而发生了嬗变,张佩瑶在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的过程中,灵活地选用目标语中的“异词”译介源语中的“同词”,让目标读者体验到中国翻译话语之异、变与魅。张佩瑶这种扎根历史文化语境、有目的有选择的丰厚翻译策略,既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了独特的中国翻译话语,又围绕着中国传统译论的“本源”,让历史发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积极的译者对知识迁移过程、知识转换结果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具体包括知识的再

生产、加工、转换过程及翻译标准(Røvik, 2023:151)。在《选集·导论》部分,张佩瑶指出,“scriptures”(经籍,经文)一词与基督教相关,“sutra”与佛教联系紧密。尽管英语世界在提到佛经经文时多使用“scriptures”,张佩瑶在对“佛经译论”一词的知识再生产过程中,考虑到话语、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将其译为“Buddhist sutra translation”,以彰显佛经译论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属性(Cheung, 2010:1)。需要注意的是,张佩瑶在《选集·引言》部分明确提出要掌握好“丰厚翻译”和“厚的翻译”二者之间的度,避免“辞敷而言重”。有鉴于此,张佩瑶主张脚注信息应尽可能简短,并做到非必要不加注,充分贯彻了读者友好型的翻译诗学。

从知识考古与丰厚翻译的视角来看,与其说《选集》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不如说它是一部融文学、历史、民俗文化为一体的经典中国翻译话语杰作。作为知识的搬运工,张佩瑶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杨枫, 2021:2),通过知识考古还原历史现场,借助丰厚翻译实现知识迁移,将翻译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相结合,将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并置,赋予文本丰厚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2 太极推手与话语互证

在将中国传统译论英译的“知识生产变迁”过程中,张佩瑶(2012:14)借助“太极推手阴阳相反相济的原理,将时常被认为是对立或互不兼容的立场,如知识的客观性与知识的主观性,西方之于东方,主次之间的关系尝试发展出非此即彼以外的思考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研究的“太极推手”路向。这种将东与西、主与次间的关系尝试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格局下考察的研究方法,与知识翻译学“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杨枫, 2021:2)。道格拉斯·罗宾逊(Robinson, 2016:10)在《翻译推手及其理论》(*The Pushing-Hands of Translation and Its Theory*)一书中从性别政治、对话视角出发深入阐发了张佩瑶提出的推手理论,指出推手模型是一种互动关系的类比;这种现象的功能不仅指引了我们与他者的对话,更是指导我们对这些对话的构建,强调把研究方案想象为对话的情感认知进程。罗宾逊用“对话”关系生动形象地解释了张佩瑶“推手”路径中所倡导的众声喧哗、中西调和、相反相济的知识传播理念和文化自我再现途径。

在《选集》英译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张佩瑶秉持知识的调和性与中西对话的推手路径,“通过资料搜集、文献考证、话语分析、历史语境化等手段”(胡安江, 2022:14),深挖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化、知识、话语,发挥译者“媒”的作用,促进地方性知识转变

为世界性知识,将中国翻译话语传播到世界翻译史场域中。在《选集》的第二部分的佛经译论中,张佩瑶采用英文、汉字加拼音三种方式同时出现的译法译介中国翻译话语,将中国概念与西方表述糅合在一起,如“Zhou Rites 周礼(zhouli)”“yi 译(translators/interpreters)”“Emissaries’ Record of Dialects and Languages of Regions in the Main Plain in Ancient Times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Youxuanshezhejuedai yushi bieguo fangyan)”等,这种英中有汉、字音相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推手路径”,有机地将目标语言与源语知识加工在一起,尝试打破单一语言主导的局面,“为目标语读者生产兼具可理解性和一定陌生性的译文”(邵璐等,2024:127),探索文化互补、和合共生的新途径。

从文本选择,到译介过程,再到译本传播,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体现了翻译与知识、话语、权力之间的角力关系。通过借鉴法国文学及思想史学者米歇尔·福柯对话语的界定,张佩瑶认为“语言是话语运作的原材料、意识形态的载体。在翻译活动中,语言即话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具有研究价值”(张佩瑶,2003:15)。“作为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地域的文化行动者和文化调停人”(胡安江,2022:8),张佩瑶在《选集》的翻译实践中,收集了中国历代与翻译话语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记载,共82项条目。其中与翻译话语有间接关联的中国文论25条,通过中国古典文论《庄子》《论语》《左传》等经典语录之间的话语互证,使文本与文本对话,发挥话语的表征及建构作用,推动中国翻译话语的经典建构。以第24个条目为例,张佩瑶在正文前增加了前言、标题、引文出处,并辅以评论、脚注阐释中国古代翻译话语中“译”的含义及来源。据《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张佩瑶在脚注中引用唐朝儒家、经学家贾公彦对“译”的阐释“译(translate)即易(changes)”,也就是说,用另一种语言来改变或替代一种语言中的话语使其能被理解(Cheung,2010:1)。为了重构与再现源语中“译”的语法意义和文化内涵,张佩瑶将此处的“译”翻译为“translators/interpreters”。译者这种有意识地深入历史、挖掘史料、文史互证的译介方式,不仅赋予《选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也让目标读者关注到显性话语背后那些无声、被遮蔽的隐形翻译话语,有助于中国传统译论的自我再现。

翻译是知识扩散的重要途径,而知识的流通是协商和对话的过程(杨朝军等,2023:84)。张佩瑶在译介中国传统译论时,兼顾了知识的专业性与故事性,采用太极推手路径调和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使《选集》发挥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选集》第29个条目介绍了三国时期僧人支谦《法句经序》中的翻译话语,该段论述融入了老子、孔子的文学翻译观,以道家儒家代表人物的话语来阐述支谦的佛经翻译理念。详见下文:

At first I found it lacking in elegance (yǎ 雅), but Vighna said, “... If a sutra translation i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no meaning is lost, then it is a good translation.” The people who were present all agreed to this and said, “Laozi cautioned that ‘beautiful (mei 美) words are not trustworthy (xin 信) and trustworthy (xin 信) words are not beautiful (mei 美)’ , and Kongzi made a similar remark, ‘writing cannot fully express what is conveyed by speech; speech cannot fully express ideas.’ This shows how fathomless and limitless the thoughts of the saintly sages are. Today when we translate the sutras, we should directly convey the meaning (jìngdá 径达).” (Cheung, 2010: 59)

文中不仅讨论了译经的方法需“不加文饰”,以及一部好的佛经翻译作品应做到“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同时借用中国道家代表人物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传统话语,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知识调和、思想加工的话语互证路径,诠释了三国时期佛经翻译的标准“径达”,从文学、美学视角阐明了支谦对佛经翻译话语的看法。此外,译文在形式上保留了源文顶真的修辞手法,“trustworthy”对译“信”,“speech”对译“言”,使英文读者一目了然,易于译本的接受和传播。

翻译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把原作引入了一个新的知识圈,在这个知识圈里存在着与原作所在知识圈相异甚至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存在着相异甚至相去甚远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欣赏习惯。为了将中国传统翻译话语推向世界,张佩瑶以《道德经》《论语》《庄子》等文论作为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知识根基,通过太极推手路径把传统译论置于文化史或翻译史的大背景下来阅读,为开展中西译论平等对话、提升中国翻译话语创造条件,发挥译者文化调停人的身份和功能,引经据典发挥文本话语互证的功用,推动中国翻译话语与他者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协商。

3 译本传播与读者评价

在推动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的进程中,译本传播与读者评价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和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其他文化(或称‘他者’文化)都有较大的兴趣,愿意去认识了解。他们尤其重视差异,希望从中看到他者文化的特质”(张佩瑶, 2007: 37)。在此国际大背景下,张佩瑶顺应时代要求带领专业团队推出《选集》,通过与国际著名出版社合作、名家评传提高译作的话语资本和传播力度。下文将聚焦《选集》的传播发行渠道、国外图书馆馆藏量和读者评价三个方面,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翻译在知识加工、传播过程中的建构作用。

2006年,《选集》由劳特里奇(Routledge)和圣哲罗姆(St. Jerome)国际知名出版社在海外发行,并得到国内外专家团队的支持与参与。国内知名学者林茂荪担任顾问编辑,白立平担任导读,罗新璋、朱志瑜等传统译论专家学者参与《选集》的编选工作。资深译者的参与无形中增强了《选集》的学术专业性和话语权。毫无疑问,教育系统具有“把统治文化加以合法化的权力”(胡安江,2011:225)。201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将《选集》作为“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引进国内,并列为全国高校翻译专业必读书目。这种将译作回引至本土语境并进入大学课堂的返程之旅和“二次传播”模式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翻译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力度和可信效度,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毋庸置疑,图书馆馆藏量能很好地反映一部作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在线编目联合目录数据库(Worldcat)是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其检索结果(检索日期2024年9月10)显示,《选集》在全球共有15个版本,分布在世界各地173个图书馆内。以美国为例,共计51家知名图书馆收藏《选集》,其中大学图书馆有43家,占比84%。说明该译本在美国学术界知名度较高,目标读者主要是研究型专业人士;公共图书馆馆藏量反映了《选集》与大众读者之间的互动,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二者共同促进了中国翻译话语的传播。其次,通过亚马逊英美网站(Amazon)、好读网(Goodreads)搜索《选集》的国际销量排名及大众读者评价,发现好读网上大众评价虽然只有一条,但评价很高。读者表达了期待阅读《选集2》,并表示很喜欢这种将中国早期(春秋战国时期等)语言文学相关论述融于一体的译介方法。为了客观评价《选集》在美国的传播情况和影响力,笔者以“2006 Routledge Discourse”为主题在WorldCat上搜索相关书籍,人工排除无关信息后共搜到两本同年份出版的“话语”类书籍:*The Chinese Particle L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Marking in Chinese; Confucian Capitalism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 Myth of Chinese Enterprise*。现将这两本书在好读网和亚马逊网站搜索到的国际销售量与《选集》作对比,详见下表:

表1 2006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话语”类书籍国际销量一览表

书名	英文畅销书排名	佛经类书籍排名	语言类书籍排名	翻译参考类书籍排名
<i>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i>	4 865 816	2 649	4 552	3 432
<i>The Chinese Particle Le</i>	无	无	无	无
<i>Confucian Capitalism</i>	无	无	无	无

通过与同年份、同出版社的英文话语类书籍对比,可发现另两本英文书籍在国际销量方面甚少,并没进入排名榜单。而《选集》在英文畅销书、语言类书籍排名中均榜上有名,专业类书籍尤其是佛经及翻译参考类书籍排名分别为2 649、3 432。由此可见,《选集》无论是在国际销量或读者影响力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同时期出版的话语类书籍。

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与传播是一对孪生姐妹(杨枫,2021:17)。译本传播与读者评价息息相关。一方面,译本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引发读者评价;另一方面,读者评价尤其是专业读者评价对译本的知识传播起到助推作用。自2006年出版伊始,《选集》就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及赞誉。英国牛津大学的雷诺兹(Reynolds,2008:87)高度赞扬了《选集》的编撰方式,从编者的选材内容、翻译策略、翻译思想方面进行了讨论,指出赞助人、诗学、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英国汉学家闵福德(Minford,2010:322-324)充分肯定了《选集》的知识价值和史料价值,指出《选集》不仅对翻译研究学者来说具有宝贵价值,也能使关注中国思想、文学、文化的学生从中获益,美中不足的是《选集》缺少对等的中文原作,若有之将更完美。翻译家麦约翰(Meyer,2010:158)高度赞扬了《选集》读者友好型的内容安排,并指出了两点不足。其一,因多数编者是中国人,难免会有目前在中国广为接受但却遭到西方汉学界质疑的观点融入文本;其二,书中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争论均以偏袒佛教视角的方式书写,无一以道教的口吻直接论述,显得有失偏颇。麦克马斯特大学贝剑铭(Benn,2008:133-134)的整篇书评尽管语气委婉,仍用了近半篇幅指出《选集》中佛教用语不一致、印度术语误译等问题,并附加了例证。毋庸置疑,《选集》读者友好型的编排模式及专业知识话语得到了国外读者的认可和称赞,但译本中个别术语的准确性也受到部分专业读者的诟病,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外译提供了宝贵经验。

与国外专业书评为主的局面相比,《选集》在国内同样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张旭、王辉、白立平、李红满、胡安江从“失语症”与“话语呈现”“深度翻译”与“格义与归化”“中西话语对话”与“选、译、评、注原则”“中国翻译话语”与“融合东西、贯通古今”“翻译史研究方法”与“太极推手路向”视角分别对《选集》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和剖析,高度赞扬了张佩瑶在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时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径和译介方法、前瞻性的学术视野、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知网上按“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张佩瑶”为主题进行搜索,共检索到相关期刊论文八篇,硕士学位论文四篇。期刊论文中黄忠廉等(2022)只是泛泛提到《选集》不乏史料价值,但有明显不足:“缺乏总结力与揭示力,无精当概括;虽向国外同行宣介中国传统译学思想及其渊源,但所用术语框架基本源自西方,读后印象是中西译论趋‘同’而非‘异’,其理论创新价值受限。”其余文献上文已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积极开展张佩瑶研究,从多种角度进行深入探索,其中黄增(2020:vii)采用文献分析法,搜集了译者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论文、译作、专著,理清其致力于构建的翻译话语体系,重点放在张佩瑶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探索其方式方法给当代中国翻译话语走向世界带来的启示。

总之,国外有关《选集》的专业书评肯定了译本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但也指出了译本无法溯源、英译与文化霸权、话语重构专业性有待商榷等问题,为中国文化外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国内专业书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一致对《选集》进行了高度评价,通过文本细读探寻建构中国翻译话语之道。张佩瑶的大学教授头衔及国际知名学者的“话语生产者身份,通俗易懂的话语叙事策略”,再加上与国际著名出版社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译作的公众属性和公共影响力”(胡安江,2023:76),推动了译本的国际国内传播;而大众读者评价与学界专业评价无形中增加了《选集》的话语资本,从而助推中国翻译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4 结语

通过对张佩瑶《选集》中的知识加工、话语重构及再传播的文化行为考证,本文发现译者在将中国传统译论英译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可资借鉴:

其一,译本兼顾知识的专业性与趣味性。张佩瑶在译介中国翻译话语时通过添加前言、小标题、评注等丰厚翻译策略,将中国文论、佛经译论与历史、社会、文化相融合,借助知识考古重构源语文本的历史语境,彰显中国传统译论的文化他性和真实性。真实的他者文化再现及生动的历史文化故事有助于《选集》勾勒出比较完整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融通中西文化差异,吸引潜在目标读者。

其二,博古通今的外译团队及话语互证的译介模式。张佩瑶出生并成长于香港,后又负笈英国求学。多语言的文化成长背景赋予译者广阔的研究视域、包容的文化心态;特殊的求学经历促使译者关注翻译如何发挥知识生产、话语重构的作用。在组建《选集》外译团队时,张佩瑶发挥“太极推手”的翻译史研究路径,联合罗新璋、马祖毅、朱志瑜、香港话剧翻译家黎翠珍等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与《选集》的词条收录及编辑翻译工作,确保译作的知识专业性和学术权威性。在翻译过程中,张佩瑶借助中国传统文论及佛经译论之间的话语互证,让不同声音同时出现在《选集》中,尝试摆脱中与西、古与今的二元对立模式,探索中国翻译话语独特的呈现方式,推动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迁移和转换。

其三,权威出版社发行及专业读者书评。作为翻译活动的赞助人之一,出版社对提升译作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着巨大作用。张佩瑶率领专业团队皓首穷经提高译作质量的同时,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圣·哲罗姆(St. Jerome)出版社成立于1995年,一直致力于出版翻译研究领域期刊(如*The Translator*)、学术专著、词典等,其出版内容和质量深受各国翻译研究者赞誉。因此,《选集》由世界知名出版社圣·哲罗姆出版,无形中提升了译作的

国际传播力和学术话语权。其次,国内外知名学者针对《选集》发表的书评大大提升了译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01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将《选集》作为“国外翻译研究丛书”推荐书目引进国内各大高校及图书馆,充分表明该译作在国内外学界得到了广泛关注,实现了张佩瑶在国际上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初衷。

总之,上述几点从知识翻译学视角下考察了张佩瑶及其专业外译团队通过知识考古与丰厚翻译将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历史感与现实观相结合,通过太极推手与话语互证做到文本内的众声喧哗与中国翻译话语的自我再现,通过译本传播与读者评价将目标受众的接受度、国内外影响力纳入考察范围,增强译作的话语资本,使中国翻译话语在世界场域中得以发声,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行了方法论上的积极探索。

参考文献:

- 胡安江. 2011. 寒山诗: 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胡安江. 2022. 知识考古、话语重构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5): 12-21+161.
- 胡安江. 2023.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评估研究——以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中国文学英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 73-78+95.
- 黄忠廉, 傅艾, 刘丽芬. 2022. 中国译论发展研究——未来走向[J]. 中国外语 (5): 88-95.
- 黄增. 2020. 抵抗还是迎合? ——张佩瑶译学观念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
- 米歇尔·福柯. 1998.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邵璐, 李伟超. 2024. 文本内外:《钟鼓楼》英译传播多元行为者之“众声”研究[J]. 外国语文 (4): 118-129.
- 杨枫. 2021.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 (5): 2+27.
- 杨枫. 2022. 知识翻译学的翻译定义与分类[J]. 当代外语研究 (1): 1-2.
- 杨朝军, 炎萍. 2023.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J]. 外文研究 (3): 82-88+97+109.
- 张佩瑶. 2012. 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译学研究新途径[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张佩瑶. 2007. 从“软实力”的角度自我剖析《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 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的选、译、评、注[J]. 中国翻译 (6): 36-41.
- 张佩瑶. 2004. 对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几点建议[J]. 中国翻译 (5): 5-11.
- 张佩瑶. 2003. 从话语的角度重读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黑奴吁天录》[J]. 中国翻译 (2): 15-20.
- 张旭, 黎翠珍. 2014. 风筝不断线——张佩瑶教授译学研究纪念集[G].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Appiah, A. 1993. Thick Translation [J].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 808-819.
- Benn, J. 2008. Review of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32-134.
- Cheung, Martha P. Y. 2010.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Meyer, D. J. 2010. Martha P. Y. Cheung. (ed.)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 157-158.
- Minford, John. 2010. Review of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3): 321-324.
- Reynolds, Matthew. 2008. Review of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A Historical Reader, and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 1: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J].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1): 83-93.
- Robinson, D. 2016. *The Pushing-Hands of Translation and Its Theory* [M]. New York: Routledge.
- Røvik, Kjell Arne. 2023. *A Translation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 Learning across Organizational Border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udy on Martha P. Y. Cheu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Tak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WEI Lijie

Abstract: Transknowletology views translation as a cultural activity and social practice involving the cross-language processing, reconstruction, and re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By examining historical translation contexts alongsid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s, this approach broadens the scop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ntroduces new academic dimensions. This paper, from a transknowletology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knowledge processing,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by the renowned translator Martha P. Y. Cheung in her work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eung employs knowledge archaeology and thick translation to process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She balances and reconstructs this discourse through Taiji pushing-hands and discourse verification. Furthermore, by examin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ranslations and reader evaluations, Cheung ensures that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transitions from local to global understanding. This provides a valuable model for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Transknowletology; Martha P. Y. Cheung;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责任编辑:陈宁